

# 拒斥与吸收

教育视域中的理学与佛学关系研究

·张学强 著·



巴蜀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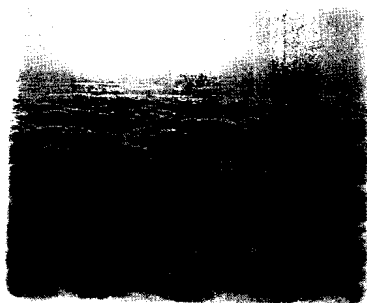
137

G40-0/2.44  
Z35

# 拒斥与皈依

## 教育视域中的理学与佛学关系研究

·张学强 著·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拒斥与吸收:教育视域中的理学与佛学关系研究/张学强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2.7  
ISBN 7-80659-330-6

I. 拒... II. 张... III. 理学—儒家教育思想—关系—佛教 IV. G40-09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039 号

---

策划组稿:谭晓红  
责任编辑:谭晓红  
封面设计:李文金

**拒斥与吸收**

教育视域中的理学与佛学关系研究      张学强 著

---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190 千  
2002 年 7 月第一版      200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 册

---

ISBN 7-80659-330-6/B·49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序

近年来，同教育学其他领域中的研究一样，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中国教育通史、教育断代史、教育专题史、民族教育史、地方教育史、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等领域出版或发表了很多具有较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在质和量方面较以往都有了较大的突破，这是相当令人欣慰的。同时，在教育改革日益向纵深方面开展的今天，强调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应更为重视。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提高研究的质量，使我们能更好地掌握教育发展规律，继承中国教育发展中的优良传统，为当代的教育事业发展服务，是摆在每一位中国教育史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有着非常丰富和重要的研究内容，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有许多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去挖掘、去思索。如关于理学教育与佛、道教育的关系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值得我们去研究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的一个课题，而张学强同志的专著《拒斥与吸收——教育视域中的理学与佛学

关系研究》，对理学教育思想与佛学教育思想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当属开拓之举。

理学是在受佛教和道教等思想流派影响下出现的，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数百年间儒、佛、道三教相互对抗与融合的产物。宋明时期诸大儒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及王守仁等人几乎都有一段出入佛、道的经历，肯定吸收了佛、道的一些思想从而完善了理学。对于理学与佛、道的关系，在哲学界中曾有一些研究，但理学教育与佛、道的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理学教育有没有吸收和借鉴佛、道教育？如果有，究竟是如何借鉴的，其结果如何？如何认识理学家对佛、道教育的批判？如何在儒、佛、道三教既相对抗又相融合的文化发展背景中认识理学教育的性质与作用？这些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也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必须加以研究的重要课题。

张学强同志的专著《拒斥与吸收——教育视域中的理学与佛学关系研究》一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近三年的反复修改而写成的，加上前期的资料搜集与写作，历时七、八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充满着艰苦的求知和探索的过程。张学强同志长于思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确定了这一比较符合他的研究风格的课题，而从研究的结果来看，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的，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等方面，都有其创新之处，有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未发，确能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他在研究方法上，非常明确地坚持辩证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指导思想，将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用动态的眼光来考察研究问题，不仅为我们勾勒出理学教育思想与佛学教育思想的互动脉络，而且也使我们对于理学教育思想对佛学教育思想的吸收与批判

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在研究结论上，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我认为是有分析深度的、切合实际的，如认为理学与佛学的互动的核心是教育哲学或为人之道，理学教育思想对佛（及道）教育思想的吸收是其自身得以发展的重要动因，而对佛学的批判又是保持其儒学属性的重要保证，并对这种吸收与批判进行了全面细致且深入的分析，对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张学强同志是从事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的年青有为之士，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专注于学术探索，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相信他在弘扬中华教育精神、总结继承优良教育传统方面，将继续进行开拓研究，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孙培青**

2002年6月13日于上海

# 目 录

序	( 1 )
序论	( 1 )
一、问题的提出	( 1 )
二、理学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5 )
三、儒佛关系的简单回顾	( 9 )
第一章 援佛入儒：周敦颐教育思想与佛学关系论	( 18 )
一、周敦颐：理学教育思想的奠基者	( 19 )
二、周敦颐与佛学：理学教育思想产生中的佛学因素	( 21 )
第二章 异中有同：张载教育思想与佛学关系论	( 33 )
一、张载对理学教育思想的发展	( 33 )
二、“存顺没宁”：张载对佛学修养论的批判	( 36 )
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佛学对张载教育思想的影响	( 50 )
第三章 融佛拒佛：二程教育思想与佛学关系论	( 54 )
一、二程对理学教育思想的发展	( 54 )

---

二、“必有可观”与“吾道自足”：二程对佛学的矛盾态度分析·····	( 57 )
三、贵性与贱性：二程论儒学与佛学教育思想之不同·····	( 60 )
四、重解“止”、“定”：二程与佛学修养论辨别·····	( 66 )
五、万理归一与理一分殊：佛学对二程教育思想的影响·····	( 69 )
<b>第四章 入释出释：朱熹教育思想与佛学关系论·····</b>	<b>( 77 )</b>
一、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 77 )
二、从求佛到弃佛：朱熹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佛学的关系·····	( 83 )
三、上悦下效，有碍儒化：朱熹论佛学对儒学教育的危害·····	( 86 )
四、“空理”与“实理”：朱熹对佛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 91 )
五、“理事无碍”与“理一分殊”：佛学对朱熹教育思想的影响·····	( 97 )
<b>第五章 禅儒之争：陆九渊教育思想与佛学关系论·····</b>	<b>( 105 )</b>
一、陆九渊：心学教育思想的奠基者·····	( 106 )
二、禅耶？儒耶：陆九渊教育思想属性问题的提出·····	( 110 )
三、内儒外禅：陆九渊教育思想的儒学属性辨析·····	( 112 )
四、“惟利惟私”：陆九渊对佛学修养论的批判·····	( 118 )
五、“一悟成佛”与“一是皆是”：禅学对陆九渊教育思想的影响·····	( 122 )
<b>第六章 以儒统佛：王守仁教育思想与佛学关系论·····</b>	<b>( 128 )</b>



---

一、“致良知”：王守仁对心学教育思想的完善·····	(128)
二、“溺于佛氏”与“归于圣贤”：佛学与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形成·····	(133)
三、“成就一个私己的心”：王守仁对佛学修养论的批判·····	(138)
四、“求尽其心”：佛学对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影响·····	(146)
五、“以儒统佛”：王守仁教育思想的儒学属性辨析·····	(161)
<b>第七章 儒释之辨：理学家对佛学教育思想的批判简论</b> ·····	(165)
一、从批判的角度看·····	(167)
二、从批判的主线看·····	(168)
三、从理学儒释之辨展开的层面看·····	(173)
四、关于研究态度·····	(176)
五、几点结论·····	(179)
<b>第八章 融合儒佛：佛学对理学教育思想的影响简论</b> ·····	(190)
一、“四书”作为教育经典的确立·····	(196)
二、心性本体论的建立与完善·····	(203)
三、人与万物关系的教育价值观念的转变·····	(220)
四、语言文字在教育中地位与作用的重新认识·····	(230)
五、“无”的境界论的提出·····	(239)
余论·····	(248)
主要参考文献·····	(252)
后记·····	(261)

# 序 论

## 一、问题的提出

我们知道，理学教育思想同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相比，体系更为完整，思辨水平也更高。理学家对于教育存在的最终根源“理”的界定，对于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理论前提即人（心）性论的设定，对于教育、教学方法以及教育价值、教育境界的论述大大超过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理学教育思想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它之所以能远超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便是佛学对它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理学教育思想正是理学家以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为基础对佛学等思想资料进行批判性地吸收的产物，对佛学的批判使得理学教育思想保持了儒学的属性，而对佛学的吸收又使得理学家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儒家教育思想。那么佛学是在哪几个方面影响并促进了理学教育思想的发展呢？理学家又是如何批判佛学以保持理学教育思想的儒学属性的呢？应该如何评价佛学对理学教育思想的影响以及理学家对佛学的批判呢？

对理学教育思想的发展与佛学关系进行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其一，理学是一个以理学家之本体论、人性论及认识论等哲学思想为主体并旁涉经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军事学、自然科学、文学、法学等广泛领域之博大体系，其中，教育思想是作为其主体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或者说，理学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教育哲学。同样，佛学从本质上讲也是一种教育哲学，只不过其宗教性比较突出一些而已。因此，从教育学的视角考察理学与佛学的关系无疑更能把握两者本质的联系。

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sup>①</sup>这一论断无疑是非常高明的。作为儒学发展高峰的理学更是如此，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等为代表的理学家各自苦心经营的思想体系无一例外地指向一个目标：修养论意义上人与理、心与理的统一，而这归根结底是一个教育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心性论及社会政治伦理思想等，它们时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法分开，理学家都是教育家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佛学<sup>②</sup>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其核心也是教人通过持戒、禅

<sup>①</sup> 张岱年：《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1期。

<sup>②</sup> “佛学”与“佛教”这两个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佛教”包含“佛学”，内容相对而言更加广泛一些，主要包括佛教领袖、教规、教徒、教义以及佛教建筑、佛教艺术等一系列因素；而“佛学”一般指“戒”、“定”、“慧”三学，主要指成佛的根据、方法及境界等。准确地讲，对理学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是“佛学”，故本文一般用“佛学”而不用“佛教”，须用“佛教”一词更为合适时则用“佛教”。

定等途径了悟佛性<sup>①</sup>真谛，而具般若智慧，最终超脱生死轮回，涅槃成佛而具常、乐、我、净四德。从东汉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以来近两千年历史中，儒佛两家既相互拒斥又相互融摄，彼此影响不可谓不大<sup>②</sup>。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从成人之道的视角看待理学与对其从正反两方面讲都有重要影响的佛学的关系，应当说更有助于把握理学思想本义，反过来又可加深我们对理学教育思想的认识。

其二，理学及其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受到佛学非常大的影响，没有佛学的影响，理学及其教育思想是很难产生和发展的，但目前学术界多侧重于佛学对理学哲学体系和逻辑结构的影响及

<sup>①</sup> 佛性是指成佛的可能性，大乘佛教除唯识宗外，大都承认众生具有佛性，都可成佛。中国佛教流派（唯识宗除外）如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都倡导众生与佛同具佛性。

<sup>②</sup> “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是当今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与儒佛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探讨理学教育思想与佛学的关系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是学，也是教化之教，但非宗教之教（蔡尚思：《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儒学的教化是在超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存在的名义下进行的，因而也是宗教之教（李申《教化之教就是宗教之教》）；也有学者认为，儒学本身经历了一个从“学术”到“宗教”的发展历程（季羨林：《儒学？儒教？》）；而有的学者则认为，教化之“教”与宗教之“教”的区别是人为的，因为任何体制化或精神化的宗教都具有教化的功能，儒学是精神化的宗教，儒家的灵魂救济有着丰富的宗教资源（张立文：《关于儒学是“学”还是“教”的思考》，上引诸文见《新华文摘》1998年第10期）。汉学家秦家懿和孔汉思认为，儒学传统在其起始时便已包含了对超越境界的认识这种宗教品格，在儒学内涵深处包含有浓厚的宗教性，并认为中国哲人型传统（儒学传统）是与犹太先知型传统、印度神秘型传统这两大宗教系统并列的第三个系统（参见秦家懿和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87页、105页）。对以上诸论笔者不敢妄加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儒学发展高峰的理学无疑是一种既现实而又超现实的、具有浓厚的终极关怀情趣并被本体化了的思想形态，因而也被赋予了某种宗教性的品格，它所关注的重心在于人的自身而非宇宙。也正是因为如此，理学与佛学在历史上的关于成就自我（成圣、成佛）的对话才显得如此重要，谢扶雅所谓三教（儒教、佛教与基督教）“皆以人事为出发点而非以自然为出发点”也包含此意（见谢扶雅：《宗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两者性质同异的探讨，而在目前的理学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对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儒学渊源、思想体系和内容特征的研究较多，而对理学家的教育思想与佛学关系的个案研究则少之又少，更遑论从整体上考察两者的关系。佛学对理学教育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理学家批判地吸收佛学本体论、人（佛）性论及认识论，为理学教育思想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理学家为了回应佛学的挑战而建立了自己的经典体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道统谱系（由尧开端，中由舜、禹、商、汤、文、武、周公、孔、孟，而由理学家接续于千年之后），前者为理学教育乃至封建社会提供了最终的权威性教材，后者为理学教育提供了道德修养的理想目标；由于佛学的影响使得理学更加坚定了“内圣外王”培养模式和注重自我修养的教育特色；在修养境界论和具体的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佛学对理学教育思想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另外，为了对抗佛学修养论对儒家教育的冲击，理学家更加突出了在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中就已经非常明显的世俗化和伦理化的特点。

其三，许多年来，对理学与佛学关系的研究普遍有这样一种做法，即对理学家在吸收佛学中所表现出的创造性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把吸收看成是一种简单的模仿和移植，而没有看到理学对佛学的吸收实际上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思想追索的过程，一个有着数年乃至数十年痛苦与喜悦的艰难的心灵发展史，也是一个体现丰富创造性的过程，而正是这种创造性构成了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真实内含，才使得外来的佛教文化与本土的儒家文化成功的融合而产生了理学这一中国思想史上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理学家在吸收佛学时所表现出的创造性应给予足够的关注，也只有

在研究中努力挖掘这种创造性才有可能获得对理学（教育思想）整体的真切的把握。

其四，对理学教育思想与佛学关系的研究是进一步深化儒佛道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也会有很大的启示。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道、佛三大文化并立的文化发展格局，儒、道、佛三家既相互对峙，又互相渗透。从占主体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发展而言，它既与道家（教）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吸收道家（教）的思想，但它同佛学（教）的关系更为重要，对佛学（教）的吸收与批判是理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理学与佛学的关系是儒、道、佛三教关系研究的一个重心。本文试图从理学教育思想的发展着眼，力求就理学教育思想对佛学的批判与吸收进行较为全面的整体性的探讨，以期对上述诸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解答，从而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二、理学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理学是在宋代产生、明代继续发展的专门讲求心性义理的学术思想，是在天道性命的本体层面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儒学的新儒学，大致包含宇宙本体论、心性伦理学、认识论、教育思想和政治主张等几个方面，而这几方面又是密不可分的。理学以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以及明代的王守仁等人为主要代表，大致可分为张载气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三个流派。

理学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对中国哲学史上“理”的概念的继承和改造，把它提升为最高范畴，使其成为一个先验、永恒的绝对本体，将其贯穿到人性论、认识论、教育思想与自然哲学中，从而代替了以往哲学中“天”的地位。而对理的种种界定，无非是为其内圣之学奠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理学最终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对理的形上界说为儒家内圣之学提供较先秦儒家更为完备的理论基础，因而，理学可以说是“一种‘学圣人’的思想运动”<sup>①</sup>，理学教育思想在理学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是理学特性的集中体现。

理学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在本质上适应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阶级关系的调整及整个封建社会等级制度进一步巩固的要求。作为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拓深，它的出现和中唐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变化分不开。由于经济上以土地出租为基础的租佃制成为普遍经济形态，社会阶级关系上非身份性地主取代门阀地主，政治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出现以及官僚体制、科举制度的成熟，尤其是从唐末到五代封建伦常的大规模沦丧、到北宋时需要重整再建成为理学教育思想产生的直接根源。同时，作为一种思想形态，理学教育思想有其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质言之，它是在一定文化领域内、在其特定的价值观熏染下以继承、创造、吸收、借鉴、拒斥等多种方式处理各种前代思想资料后产生的，是先秦儒家教育思想历经由汉到唐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儒、道等异质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下创新的必然结果。

---

<sup>①</sup> 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从儒学教育自身的发展来看：由汉至唐，儒家中经学占有学术主导地位，经学又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经学“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sup>①</sup>。在汉代，今文经学主要在官学中传授，古文经学主要在私学中传授。经学的传授，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今文经学者重微言大意的阐发，以经学附会政治，宣扬神秘主义；古文经学重名物考证，有流于空疏烦琐之弊，学者有终其一生而不能通晓一经者，正如刘歆所谓“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sup>②</sup>。进入宋代以后，经学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教育形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伴随新的教育形式的出现，用来批判旧的教育形式同时为新的教育形式奠定理论基础的新的教育思想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先秦儒家教育思想虽然经过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神学目的论的补证，但其最终缺乏思辩的本体论支持，理论体系不成熟、不严密，缺乏说服力，并且把有意志的天作为其道德规范的最终依据，同传统的现实人文精神相背离，部分地导致了两汉、魏晋及隋唐儒家道德伦常的逐渐衰落。隋代王通、唐代韩愈与柳宗元等人虽对儒家教育思想有发明之处，还远远不能担当起破旧立新的历史重任来。但是由于先秦儒家封建伦常本质上适应大一统的封建宗法等级社会，一旦社会历史条件成熟、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料完备，新型儒家教育思想的出现便不可避免，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等理学家

① 周予同：《经学历史·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汉书》卷三十六。



教育思想的建构便表明了这一点。

由汉至唐中国思想文化不同派别之间的对抗与融合也促成了理学教育思想的产生。由汉至唐中国的历史主要是儒道佛三家思想不断冲撞、持续融合的历史，“有”与“无”、一重世界与双重世界成为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双重旋律，佛道思想文化对儒家教育思想产生了正负面的双重影响，其抽象的思辩体系和注重个体修炼的做法<sup>①</sup>对理学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完善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而其消极的价值观、人生观借助精巧完善的理论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伦常产生了消弥作用。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儒家伦常在本质上更适合封建社会，具有压倒佛道思想的社会存在优势，因而一旦前者对后两者的批判超越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式的从社会效用和现实利害立论的外在批判，进入入室操戈的思想批判，并用理性的眼光批判地吸收佛道宇宙论、修养论等成果来重构孔孟传统的内在批判时，就产生了精致思辩的理学教育思想。理学家大都有一段出入佛老而最终归之于儒的经历，他们一方面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老思想进行了吸收，把佛教的佛性论与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宗教修持改造成了理学心性论与“主敬”、“立诚”的伦理实践，并把道教（家）不可思议、不可名状的空无之道变成了统摄人道、物理的实有之道；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儒家入世的精神批判佛老的出世思想，从而使得理学教育思想始终保持着儒学的属性。

除此之外，自北宋以后，封建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人文精神得到强化（人的类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强

<sup>①</sup> 参阅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